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洪秀全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发了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寻找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洪秀全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一、苦苦求索

洪秀全，1814 年 1 月 11 日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的一个中农家庭。第二年全家又迁居到县城西南的一个叫官禄埔的村庄。这里山青水秀，土地肥沃，交通也比较便利，离广州城不过 90 华里左右，来去很方便，信息也较灵通。

洪秀全 7 岁进入村里私塾读书，学习传统课目——《四书》、《五经》等，但他不满足于此，喜欢另外读一些中国历史和奇异书籍，喜欢听出洋归来的人讲海外的事情。他天性聪明，想象力丰富，在孩子群中是出众的，博得乡亲们和塾师的赞许鼓励。

1828 年，16 岁的洪秀全去广州第一次参加府试，期望走科举之路而立身成名。结果名落孙山。他于是回家帮父兄种地，又被一个同窗学友邀请伴读 1 年。18 岁时，族人聘他为塾师。教学之余，继续攻读科举考试之书。可是，7 年攻读之后，1836 年第二次在广州科场考试，依然落榜。这对志在必得的洪秀全来说是个沉重打击。但此次广州之行发生的一件事却对他以后的生活发生了深远影响。那是他漫步广州街头时，第一次亲见外国传教士在路边讲演，并且得到了其散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但当时因心情烦闷，洪秀全并未细读此书。

1837 年春，他第三次去广州应试。初试时自我感觉良好，信心倍增，谁知首榜公布就被淘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使他生起了大病，在家卧床不起，四肢瘫软，精神恍惚。他做了种种怪梦，梦见自己被隆重迎接到天上一所堂皇的宫殿，一位身穿黑袍的金须老人坐在宝座上。老者说：“世上的人都是我所生，我所养，吃我粮，穿我衣，但却无人供拜我。更可恶的是，竟用我赐的物品去侍奉魔鬼。世人冒犯我，让我恼怒，你不要效法他们。”然后，老者赠给他一柄宝剑，命他斩除魔鬼，不可妄杀兄弟姊妹。

洪秀全在大病的 40 天中，经常大叫“斩妖！斩妖！”在房中奔跳不停，显然与梦境有关。病好后，他的性格改变了许多。原来他接人待物很活跃，爱用机敏、俏皮的话和人调侃，现在则不苟言笑，步履庄重，交接朋友也有了新的更高的标准。

然而，不管胸中有何壮志，现实中洪秀全还不过是个平凡的乡村教师。1843 年，31 岁的洪秀全第四次走入了广州的考场，他仍对科场心存一丝幻想。这次又失败了。残酷的现实终于使他下了决心，彻底与科举之路决裂，要独立闯出自己的路。他愤然把科考之书摔在地上，大叫：“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士吧！”这表明他头脑中已有了改朝换代的思想萌芽。

这年夏天，洪秀全的表兄李敬芳来他的塾馆闲聊，偶然看见过去从广州得到的《劝世良言》，就借回去看。几天后，李敬芳兴奋地告诉洪秀全：此书太妙了！与中国旧有的书大不相同，内容新鲜并且有道理。于是洪秀全便仔细阅读了这本书，果然对此书宣扬的宗教教义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是广东肇庆人，曾帮助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印制汉语《圣经》，并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华人牧师。《劝世良言》约 10 万字，其中一半篇幅是从新、旧约圣经中摘录的原文，另一半篇幅是梁发结

合中国特点而对圣经观点的说明。其中心思想是宣传上帝是唯一的、真正的神。上帝创造人，并创造整个世界。人是有原罪的，上帝派他的儿子降临世上，替世人赎罪。世人只有敬拜上帝才能得到拯救。

洪秀全从个人遭遇、所见所闻，联想到几年前病中的异梦，认为世间不平等的根源就是妖魔作怪，自己所梦见的天上老者就是上帝，上帝已亲自授命自己斩杀妖魔。这本《劝世良言》就是上帝所赐天书。

于是，洪秀全自称是上帝耶和华的儿子，即基督的弟弟，下降凡间是为了拯救世人，斩杀妖魔。

为了证明他在升天异梦中上帝确实给他一把“斩邪留正”宝剑，他让铁匠打制了长约 3 尺的宝剑，上刻“斩妖剑”三字，随身佩带。1843 年 7 月，他把塾馆中供奉的孔子牌位除去，表明了和传统信仰决裂的精神。他决心建立拜上帝教。

按照《劝世良言》所讲的宗教仪式，入教必须接受洗礼。洪秀全和李敬芳就自行施洗，将水浇灌于头顶，口中说：“洗除罪恶，去旧从新。”两人成为拜上帝教最早的成员。随后，洪秀全又向同窗好友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进行宣传，得到理解和响应。冯云山、洪仁玕遂在“三堆石”处举行入教仪式，再到石角潭沐浴洗礼。

这几位乡村知识分子所创立的拜上帝教，反映了农民朴素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及追求平等的农民民主思想。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一神教思想，用独尊于天下的上帝来反对传统的各种神仙偶像，打破千百年来禁锢人们心灵的枷锁。他又利用基督教的平等思想来反对社会上种种压迫及不公正现象。

但传统势力毕竟是根深蒂固的，当这几位书生非难孔子，除去孔子牌位时，乡人大为震惊，他们教书的饭碗也就砸破了，再没有学生请他们上课。他们又到附近村庄去游说，但乡人大都指责拜上帝是拜“洋神仙”，真心信从拜上帝教的人则寥寥无几。

洪秀全见传教工作在本乡难以打开局面，便想起了《圣经》中的“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一句话，受到启发，原来宗教创立者是在外乡传教获得成功的。洪秀全决定出游天下，去远方各省“宣传真道”。

1844 年春，洪秀全和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一行 4 人离开花县上路了。他们沿途贩卖笔砚，获点小利当旅途费用。先是沿珠江三角洲的顺德、番禺、南海等地考察，后又到增城、从化、清远、英德、曲江、阳山等县，两个多月时间，风尘仆仆，宣讲新道，但收效不大。冯瑞嵩、冯瑞珍已失去信心，厌倦行程，便打道回府了。而洪秀全和冯云山毫不动摇，继续西进。他俩进入了广西，先到了贵县的赐谷村，因为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住在这里。洪秀全有了立足点，又被聘为村塾教师，白天教孩子识字，晚上走门串户宣传拜上帝教教义。

赐谷村附近有一座六乌庙，供奉着一对男女神，香火较盛。洪秀全为了宣传上帝是唯一真神，便题诗怒斥六乌神，借此向传统神权挑战。这一不寻常举动引起远近乡人的震动，也招致迷信势力对他的攻击。这年秋天，冯云山和洪秀全先后离开赐谷村。冯云山进入桂平县的紫荆山区，继续做招收信徒、组织群众的工作，而洪秀全则回到家乡花县，埋头于拜上帝教的理论著述。

洪秀全在两年间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原道觉世训》、《改邪归正》等一系列作品，奠定了拜上帝教的理论基础，

集中体现了洪秀全苦苦求索的思想收获。

《原道救世歌》明确宣传了人人平等的思想，声言“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既然天下人都是上帝的子女，灵魂也是来自上天，那么世人都应是兄弟姐妹，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

《原道醒世训》则有了对社会改造的初步设想。洪秀全针对现实社会中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指出社会的主要弊病是私欲横流，“所爱所憎，一出于私”，主张变“陵夺斗杀”之社会为“公平正直”之社会。他还明确反对国与国之间相互侵夺，主张中国和番国平等。显然这是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不满。

在《原道觉世训》中，洪秀全揭示出了上帝的对立面是阎罗妖，上帝代表公平正义，而阎罗妖代表罪恶、压迫。他痛斥阎罗妖和妖徒鬼卒对人们的“缠捉磨害”，要人们奋起“共击灭之”。

对于洪秀全的夹杂着宗教教义的言辞，不能当作一般的神话和幻想看，那是深刻蕴含着阶级斗争现实意义的斗争纲领。他把贫苦农民的追求和渴望，归纳为一定要实现的、天经地义的上帝意志，而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现象概括为一定要被打倒的阎罗妖的罪行。在拜上帝教的理论中，上帝与阎罗妖的斗争直接反映了人与人的斗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

1847 年 3 月，洪秀全去广州找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打算加深对基督教的了解，进一步充实完善拜上帝教的理论。但洪秀全的言论却令罗孝全“莫名其妙”，感到不快。后来罗孝全评论说：“是把他们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罗孝全和洪秀全各有自己的政治目的，无法合作是必然的。

这年 8 月，洪秀全重入广西，与在桂平县紫荆山发动群众的冯云山会合，从此投身于火热的群众斗争中。

二、天父、天兄与天王

洪秀全来到紫荆山之时，拜上帝教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两三千成员的组织。洪、冯相见，两人都大喜过望，这标志着洪秀全回乡创立的拜上帝教理论与冯云山在紫荆山的根据地创建结合起来了。

由于多年来冯云山的介绍和推崇，紫荆山区的会众早知拜上帝教的创立者——洪秀全的大名，洪秀全如今亲来此地，大大鼓舞了会众的士气，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洪先生”，“到处人人恭敬”，拜上帝教的影响扩大，会众日渐增多。

附近象州有一个甘王庙，时常“显灵”，在民间影响很大。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人来到庙里。洪秀全用一根长竿猛击甘王塑像，大喝道：“我是真命天子，你认得我么？”接着便宣布甘王的罪状：打死母亲；冒上帝功劳；受人跪拜，迷惑上帝子女心肠；诱赚上帝子女肉食；缠捉上帝子女灵魂；教唆细妹同年共坐及唱邪歌、奏邪乐、行邪事、作怪作妖等等，然后洪秀全和众人一起将甘王塑像的眼睛挖出，胡须拔掉，帽子踏烂，龙袍扯碎，手脚扭断。

洪秀全率众捣毁甘王庙，影响很大，这不只是打掉一个“甘王”，而是打碎套在农民头上的精神枷锁，是为了鼓舞农民的斗争勇气，这是对自身力量的检阅和对地方封建势力的示威。既然被封建势力敬拜的神仙可以被打倒，那么，封建势力本身也不是什么不可侵犯的了。

拜上帝教力量的壮大，引起当地封建势力的仇视。地主团练头目王作新在 1848 年初亲率团练将冯云山逮捕，送往桂平县衙监狱，罪名是“以邪教惑众，践踏神明”，“阳为传教，阴图谋叛”。

冯云山是拜上帝教的实际组织者，他的被捕，是太平天国运动史上第一个危急时刻。此时洪秀全正在贵县一带活动，闻听消息立即赶回紫荆山，但一时尚无法营救，他又赶往广州，准备找美国传教士罗孝全，通过罗孝全的关系向两广总督申诉，说明“拜上帝”无罪，要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之会众。

这时，紫荆山区的拜上帝教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会众中有人动摇退缩了，也有人假托神灵附体反对拜上帝教教义。在当地，“神灵附体”是时常出现的现象，也为一般群众所相信。在此紧要关头，忠实而机智的拜上帝教骨干杨秀清也采取了神灵附体方式，演出了戏剧性的一幕：

1848 年 4 月 6 日，在一次会众大规模聚集时，杨秀清突然跌倒，看上去不省人事，过了片刻忽然站立，表情庄严肃穆，厉声对众人说：“众小子听着，我就是天父皇上帝！今日下凡，降托杨秀清之身，来发布圣旨。”他接着宣讲了一番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道理，劝人坚信不疑地敬拜上帝，并且第一次宣布洪秀全是万国真主。杨秀清还巧妙地解释了当前的困境，宣称拜上帝教必须有 100 天的厄运，是皇上帝对会众的考验。这是他的一个缓兵之计，估计不出百天，洪、冯就会归来。在安定众心之后，杨秀清又和萧朝贵等在紫荆山的矿工会众中筹集金钱，用以买通官府，争取早日释放冯云山。经过一番活动，桂平县知县贾桂终于作了裁决，认为冯云山的书籍和宣讲的教义，都是劝人敬拜上帝，劝人为善，并无叛逆内容，便释放了冯云山。拜上帝教会众深信上帝万能，欣喜若狂，宰牛宰马奉祭上帝。冯云山听说洪秀全已回广东设法营救自己，只在紫荆山住了两三天，也前往广州去找洪秀全。

同年 10 月 5 日，萧朝贵也效法杨秀清，假托天兄耶稣附体“传言”。他“传言”的内容，主要是要众人相信杨秀清代“天父”传言是真，要真心敬拜上帝，不要被妖魔迷惑。

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在这个时期对拜上帝教的存在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安定了会众的情绪。

1849 年 7 月，洪秀全、冯云山回到紫荆山，十分赞赏杨、萧在关键时刻团结会众，巩固发展了拜上帝教的功劳，对他们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身分予以承认，并且结成兄弟关系，排定了位次：

洪秀全自称奉天命下凡，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洪秀全为天父第二子，冯云山为天父第三子，杨秀清为天父第四子，萧朝贵的妻子杨宣娇为天父第六女，因而萧朝贵为天父的女婿，洪秀全称萧朝贵为妹夫。

领导核心确定之后，就带领会众打造兵器，训练队伍，到 1850 年，会众已过万人，有汉、壮、瑶等各族的农民、矿工、手工业工人、挑夫及穷苦的知识分子和游民等，形成了以桂平县金田村为中心的紫荆山根据地，以贵县赐谷村为中心的龙山根据地，以平南县花州为中心的鹏化山根据地等。拜上帝教已成为一个有新的宗教信仰、严明的组织纪律、明确的斗争纲领、坚强的领导核心、广大的根据地的农民运动组织。他们同清朝官吏和地主豪绅的公开冲突已不可避免。

1850 年，广西会党起义层出不穷，大规模械斗不断发生，加之农业连年遭灾，瘟疫流行，广大下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洪秀全预感到起义时机已成熟，决心带领拜上帝教会众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他豪情满怀，挥笔题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拜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洪秀全认为上天有意启示自己来拯救天下，自己的榜样就是分别灭秦建汉、灭元建明的农民起义领袖刘邦、朱元璋，这表现出他决心推翻清朝、创立新国的宏大抱负。

1850 年 7 月，洪秀全以教主的身分向各地拜上帝教会众下达团营令，要求他们于当年 11 月 4 日前到达金田。命令一下，会众群起响应，各路人马络绎不绝向金田集中。最后到达的团营人数总计 2 万余人，真正能冲锋陷阵的精干会员约 3000 余人。

数万男女老少（会众均带家属团营）齐聚一个村落，而且以往均是分散的独立家庭，如何能变成一支能战斗的大军呢？洪秀全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魅力及组织才干。

他所抓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问题，即会众个人钱财的处置及拜上帝教集体财产的管理。前来团营的各方会员，多是变卖家产后携妻带子而来，自然有贫富不均现象，如果不触动私有财产，那么“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马上出现破绽，而且以后难免发生各顾私财、贪污抢掠现象，这是兵家之大忌。所以，洪秀全确立了“圣库”制度，会员要将个人带来的财物和日后战利品一律交入公库，个人不许私藏，衣食全从“圣库”领取，官兵一律平均，这是一种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度，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理想的发展，是洪秀全实现拜上帝教教

义的一项重大措施。“圣库”制度的实行，有力保证了起义队伍生活上、军事上的需要，维护了内部的团结，而且也吸引了衣食无着的破产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有利于队伍的发展壮大。

洪秀全抓的第二个问题是组织问题，即严密地编制队伍，将会众编入军事体制，男女分别编营，虽是夫妻也不能同居一室。这是因为，如果男女混杂，夫妻同居，扶老携幼，显然是降低战斗力的。金田团营时，以犀牛岭为界，岭东各村为男营，岭西各村为女营。队伍编制以军为基本单位，由军帅统帅全军，1 军帅辖 5 师帅，1 师帅辖 5 旅帅，1 旅帅辖 5 卒长，1 卒长辖 4 个两司马，1 个两司马辖 5 个伍长，1 个伍长领 4 名圣兵。总计每军官兵共 13156 人。

军帅之上，依次是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主将、军师、天王。女军组织略有不同，一军帅管女兵 2500 人。女兵或步行，或骑马，平时主要从事劳动生产，战时拿着武器上阵。杨宣娇和苏三娘，都是著名的女将领。

洪秀全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军，老、幼不能作战的，编入“牌尾馆”。这样，把所有参加团营的会众，组织成一个严密的战斗集体。

1851 年 1 月 11 日，洪秀全 38 岁生日这天，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前的田野上，旌旗蔽天，万众欢腾，以贫苦农民、矿工为主体的拜上帝教会众两万多人，汇集金田村西边犀牛岭古营盘周围。营盘旁旗杆石上举义大旗迎风招展，战鼓阵阵，号角齐鸣。洪秀全站在营盘中间的高台上，庄严宣布武装起义，开创新朝，定国号为“太平天国”，确定 1851 年（咸丰元年）为太平天国元年，起义军称太平军。一场震撼国内外的农民大起义就这样正式爆发了。一首当地民谣曾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天国旗号飘得远，四方兄弟到金田。

兄弟姊妹都来到，降魔斩妖声震天。

洪秀全当众宣布 5 条纪律：

1.遵条命（遵守天条和命令）；

2.别男行、女行（男女分营）；

3.秋毫莫犯（不动民众财物）；

4.公心和傩（nuó，即和睦）；

5.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这 5 条军纪，既简单明了，便于执行和检查，又体现了《天条书》的基本精神，是太平军的生活和行动准则。

团营起义后，太平军蓄发，头包红巾，不遵清王朝剃发结辫的规定。因此日后被清朝官吏咒骂为“发匪”、“长毛”。

太平军浩浩荡荡从金田村出发，首战告捷，一举攻占了浔江北岸的大湟江口。江口圩是浔江、大湟江和鹏化水的汇合处，上通桂平、贵县，下连平南、苍梧，是个商业要道。清政府急忙调派钦差大臣李星沅，指挥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军队围攻，第一线指挥是广西提督向荣，清军兵力约有万人。2 月 18 日，清军分东西两路向江口圩进攻，太平军有意败阵，引清军进入伏击圈，在震天的杀妖声中，太平军全面出击，打得清军落花流水，死亡近千人。向荣的锐气受挫后，便转为守势，筑起坚固工事，凭借巨炮轰击太平军。太平军因没有巨炮，形势不利。3 月 10 日，太平军主动撤出江口圩，经新圩、莫村、金田村，翻过风门拗进山，占领了武宣县的东乡一带。

洪秀全在东乡设大本营，主力驻东乡、台村一带。东乡四面皆山，中间丘陵起伏，宽广五六十里，有大小村圩 60 多处，是该县比较富庶的地方。当地群众踊跃参加太平军，太平军没收地主豪绅的稻米浮财，基本解决了全军的粮饷供应问题。

3 月 23 日，在万众欢呼声中，洪秀全在东乡正式称“ 天王 ”，他的儿子洪天贵被封为“ 幼天王 ”。洪秀全还根据领导核心成员在拜上帝教中的宗教地位，设立五军主将，封“ 天父 ”代言人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 天兄 ”代言人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时又授予秦日纲、胡以晃、赖汉英、蒙得恩、卢贤拔、何震川、李开芳、林凤祥等领导骨干，分别为丞相、检点、指挥、侍卫、将军、总制等职。

太平天国前期的五军主将制，是带有一定民主色彩的上层领导形式，是拜上帝教中平等的兄弟关系在政权建设中的体现。“ 天父 ”、“ 天兄 ”多次“ 显灵 ”，也起着稳定军心、团结官兵的作用。

4 月 15 日，杨秀清在东乡代天父传言，教导太平军将士要绝对服从天王洪秀全的领导，声言：我派儿子下凡作天王，他的话就是天的命令，你们必须遵从。这样，使洪秀全由人变成了“ 神 ”，做“ 天王 ”也有了“ 君权神授 ”的依据。杨秀清代“ 天父 ”传言，也有统一思想的内容，要太平军将士“ 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 ”

4 月 19 日，萧朝贵代“ 天兄 ”传言，指示：“ 众小弟要守天条，要遵令，要和傩兄弟。 ”“ 要修好练正，不得入村搜人家物，打仗不得临阵退缩。有银钱须要认得破，不可分尔我，更要同心同力，同打江山，认实天堂路来跑。目下苦楚些，后来自有高封也。 ”这实际上是借“ 天父 ”、“ 天兄 ”的名义做太平军的思想教育工作，加强组织纪律管理。

三、从永安封王到定都南京

清军将领周天爵和向荣率 6000 多清军向东乡进攻，被太平军击退。5 月 14 日，太平军主动撤离东乡，飞速向象州挺进，并把大本营设立在象州的中坪墟。大批清军包围过来，太平军采取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再次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太平军从象州转攻桂平，又在桂平冲破围攻，在平南大败向荣部队，缴获大批军用器械物资。

9 月 25 日，太平军占领永安城，这是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攻克的第一个州城。10 月 1 日洪秀全在万人欢呼声中进入城内，在州署衙门设天朝宫殿。

清军虽然陆续集结到永安地区，但各将领间存在矛盾，又鉴于屡败的教训，所以只是在永安外围构筑工事，企图封锁，并不敢大举攻城，因而太平军在永安获得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时间。

洪秀全及时利用这个机会，在永安发布了许多诏令，进行了建政、整军、肃奸等工作。

为防止将士进城后不能抵御物质利益的引诱，洪秀全首先申明军纪，告诫太平军，凡攻城杀敌所得金银绸帛宝物，一律交归圣库，并公布了赏功罚罪的具体方法。洪秀全还派人下乡宣讲太平天国的政策：天兵入境，专为杀妖，希望百姓各安生业。凡愿参加太平军的，有吃有穿。洪秀全还对金田起义时颁布的 5 条纪律作了修改，变成《太平条规》正式颁布，其内容是：服从命令，爱护群众，遵守纪律，男女别营，缴获归公以及保护武器等。简明扼要，容易记忆。

对于永安城内的地方豪绅，太平军首先要他们捐献钱粮或武器，如拒绝，则发动群众出他的谷，杀他的猪，没收他的家产，其中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就杀头。

洪秀全在永安做的一件极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了政权建设，初步确立了政权机构，使“开创新朝”的理想开始落实为各种制度。

天王洪秀全改州衙门为“天朝”，听取“诸臣随时奏事”，使用“太平天国”的名号。

12 月 17 日，洪秀全颁发了著名的封王诏令，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都受东王节制（调度）。其余秦日纲、胡以晃、罗大纲等，分别授予天官、春官等丞相，晋升官职的将士有 800 余人。其主要特征是集中了领导权，明确了杨秀清统一指挥全军的责任，使东王杨秀清不仅在宗教上，而且在军政上都取得了仅次于天王洪秀全的权力。这种安排，既是出于对杨秀清的才干和贡献的肯定——杨秀清统率军队，“军令严整，赏罚分明”，功劳突出，人人叹服；也是由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加强军事上的统一指挥，需要在政权建制中增加某种集权制的因素。这一安排，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飞速发展壮大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为日后天王洪秀全大权旁落而导致天京事变埋下了伏笔。

在永安的半年多时间里，太平军得到了很好的休整，但集结在永安周围的清军也越来越多，“大军围困，内外不通”，若不及时突围，形势将会很危险。洪秀全决定放弃永安城，突围北伐，把太平天国运动推向全国。

1852 年 4 月 4 日，洪秀全对全军发布了突围北上诏，要求全军将士在突围时除了武器和替换的衣服，其它东西包括金银珠宝都应放弃。

4 月 5 日深夜，太平军冒雨突围成功，急行军北上，于 18 日到桂林城下。桂林是广西的省城，清军重兵防守。太平军围攻一月而未能占领该城，洪秀全决定继续北上。路过全州时，守城清军突然开炮，击中正在行军中的南王冯云山，伤势严重。洪秀全被激怒了，马上改变原来的行军计划，调动大军向全州猛攻，6 月 3 日攻破全州，严惩了清军和州官。两天后退出全州，继续照原来计划向湖南进军，不料在离全州仅 10 余里的蓑（suō）衣渡，遭到清军伏击，太平军伤亡惨重，战船也多被烧伤击沉。洪秀全指挥全军丢掉所有辎（zī）重，放弃北上，改道向东，从陆路进入湖南。南王冯云山因伤势恶化而去世，太平天国丧失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太平军攻下湖南道州后，进行了两个月的休整和补充。太平军在湖南开展“讲道理”的宣传工作，动员群众参加太平军。洪秀全制定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奉天讨胡檄布四方》、《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文告，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其主要内容是：

1.清朝统治的实质是“富儿当权”，“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

2.太平天国宗旨是“诛妖”、“灭胡”、“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使天下人“同享太平之乐”。

3.号召“各省有志者”、“名儒学士”，“英雄豪杰”、“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响应太平天国运动。

这三篇文告与太平天国过去的文告不同，宗教语言大大减少了，增加了对社会现实的具体分析和批判，说明“胡虏有必灭之证”，“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些都反映了民族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中，给千千万万的民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

湖南民众踊跃参加太平军，日以千计，太平军重又声势大振。大平军分兵攻克江华、永明，天地会等其他起义队伍两万人加入太平军。太平军士气大振，又接连攻占嘉禾、兰山、桂阳等地，8 月 17 日又攻下郴（chēn）州，当地有许多煤矿工人参军，这时的太平军已扩充到 10 万。其中的矿工组成土营，成为日后掘地道、轰城墙的突击力量，极大地提高了太平军的攻坚能力。

8 月下旬，洪秀全派西王萧朝贵率领李开芳、林凤祥等，带领一支 2000 多人的先锋部队向湖南省府长沙快速逼近，打算速战速决，一举攻克。9 月 11 日到达长沙郊外，开始攻城战。由于兵力单薄，西王萧朝贵为激励士气，亲自上前线督战，骑马挥刀在城下往来指挥。守城清军开炮轰击，萧朝贵不幸中炮牺牲。这是继南王冯云山牺牲后，太平军的又一重大损失。李开芳骑马飞驰到郴州向洪秀全报告噩耗，洪秀全大怒，率大军包围长沙，命令挖地道攻城，但几次激战都未成功。此时长沙城“援兵四集，城中粮米充足，火药亦多”，所以围攻了 81 天也未破城。太平军如不相机应变，只是一味蛮干，就形成和敌人拼消耗的不利局面，军事上会越来越被动。

洪秀全压抑了内心复仇的冲动，于 11 月 30 日晚指挥大军从长沙城外悄悄撤围，向西北方向攻克益阳，得到了数千条船，组建了太平军的水师，并乘船越过烟波浩淼（miǎo，）的洞庭湖，占领了岳州（今岳阳）。太平军驻益阳、岳州期间，渔民、船夫和其他贫苦群众纷纷参军，大军总数又猛增数万。太平军乘胜前进，进入湖北，接连攻占汉阳、汉口，把武昌孤立起来，三镇之间的江面上布满了太平军的战船。一夜之间，太平军在长江上扎成两座浮桥。

1853 年 1 月 12 日清晨，太平军从挖掘地道处以大量炸药轰破文昌门城墙，战士蜂拥而上，武昌被攻克了。武昌是长江重镇，素有九省通衢（qú）之称，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枢纽之地。太平军占领武昌，威逼苏皖，震撼豫蜀。咸丰皇帝调兵遣将、死守武昌的计划破产了，他急得团团转，连叫“ 愧恨 ”、“ 焦急 ”，急令两江总督陆建瀛（yíng）为钦差大臣，督兵进防江苏、安徽，企图堵截太平军。

洪秀全进驻武昌城内，以巡抚衙门为“ 天朝殿 ”，宣布“ 官兵不留，百姓勿伤 ”。洪秀全要求全军注意军纪，严禁奸淫和抢掠，在各条街道上设官巡查监督。对于没收的官府钱财和剥夺官绅大户的贵重钱物，均交圣库管理。

洪秀全又特别注意对群众的宣传，在城内筑高台，鸣锣聚众“ 讲道理 ”。又组织居民为男馆、女馆，25 人为一馆，并分发《天条书》、新《三字经》等读物。短时间内使武昌城出现新气象，群众纷纷争献钱米，还出现了参加太平军的热潮。太平军已从金用起义时的两万多人，发展成一支 50 多万人的大军。

洪秀全为了实现夺取全国的战略目标，决定顺江而下直取南京。2 月 9 日，他发布了进军江陵（南京）的命令，随即统帅大军，浩浩荡荡，水陆两路东下。水路大军由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等率领，顺流而下，陆路大军由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等率领，夹长江两岸而行。太平军进军声势极为浩大，队伍首尾长达几十里，陆地上旌旗遍野，长江上风帆蔽江。

清政府方面已乱了阵脚。钦差大臣赛尚阿、徐广缙已先后被革职拿问。咸丰帝只得重新起用向荣帮办军务，又令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驻防九江。向荣只能在陆路领兵尾随太平军，并不敢进逼交战，而陆建瀛派总兵恩长率两千江防军迎战太平军，根本不堪一击，在鄂东广济县老鼠峡，总兵恩长被击毙，江防军一哄而散。陆建瀛正在九江上游，闻讯急忙逃进南京城。江西巡抚张芾也撤出九江。太平军乘胜前进，势如破竹，占九江，克安庆，据芜湖。沿途没遇上像样的抵抗，清朝方面人人如惊弓之鸟，“ 文武弃城远避，兵勇闻风先散 ”，毫无斗志可言。3 月 7 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19 日，太平军用地雷轰塌仪凤门，攻入南京城，杀死陆建瀛。20 日，太平军队伍雄壮地列队入城，在镇压清朝官吏的同时发布安民告示：“ 人人要识天父，归顺天王，同打江山，共享天福。 ”

3 月 29 日，洪秀全在 10 多万人的欢呼和簇拥下进入南京，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朝宫殿，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

从 1851 年 1 月金田起义，到 1853 年 3 月定都南京，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军也从两万多人发展为近百万大军，这一切只不过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充分说明了太平天国起义运动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愿望，说明了清朝卖国政府的不得人心，也表明了洪秀全杰出的才干和见识。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出现了与北京清廷南北对峙的局面，这对腐败的、卖国的清政府是个沉重打击，也是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沉重打击，为推动全国各族人民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四、理想与现实

太平天国建都以后，在洪秀全心目中的主要任务已不是指挥太平军流动作战了，而是如何进行太平天国政权建设，如何在人间建造“小天堂”。

洪秀全所创的拜上帝教在很多方面是借鉴基督教的。但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所谓进入“天国”是指人死后的最理想归宿。基督教让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忍让受苦，祈望死后灵魂升天。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来世的幸福，更是现实社会中的幸福。既有天上的“天国”，也有地上的“天国”。

洪秀全说：“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上大天堂是灵魂归荣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间小天堂是肉身归荣上帝荣光之天堂。”“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故太兄（耶稣）预诏云：‘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

洪秀全把日常军政指挥大权移交给杨秀清，自己则专心研究设计“地上天国”的蓝图。这一蓝图的最集中体现，便是 1853 年底由洪秀全钦定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主要是关于土地分配和社会组织的法令，即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变土地为公有，然后分配给农民；建立乡官制度，构成新的社会组织。但《天朝田亩制度》实际包含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全体人民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方针、原则和法令，所以也可称得上是太平天国的根本大法。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堂。

洪秀全所设计的理想社会，其描绘之细致，考虑之周到，是超过以往任何鼓吹社会平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全国的土地，全部收归天王所有，土地共分为 9 等，照人口分田，不论男女，16 岁以上均可分得一份土地，15 岁以下的减半。分田以家庭为单位，好地丑地搭配，如一家 6 口人，则分 3 人好田，分 3 人丑田。

每家在耕种田地的同时，还必须从事手工业及副业劳动。每家必须种桑织布，养 5 只母鸡，2 头母猪。每 25 家设一公共库房，叫国库或圣库。农民的全部收入，除留足口粮，其余一律交公共库房，这也包括豆、麻、布、鸡、犬各物和银钱等。民间有婚娶吉喜丧葬等事，一概从国库开支。鳏（guān，指老而无妻或死了妻子的人）寡孤独病残者，也可由国库得到供给。

以上关于土地的分配、使用以及社会生产及消费，还有社会保险方面的规定，都是按照朴素共产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原则来设计的，这是一个人人各得其所的、平等的农民社会。

在上述平分土地和公有生产物、消费品的基础上，社会组织形式是军事和行政的统一体。

乡官制度是由太平天国军事制度推衍而来的。它规定：每 5 家设 1 伍长，5 个伍长之上设 1 个两司马，4 个两司马之上设 1 个卒长，5 个卒长之上设 1 旅帅，5 旅帅之上设 1 师帅，5 师帅之上设 1 军帅。1 军总计 13156 家。这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军帅以下

的官吏，由当地人民推举。军以上是县，设监军，县以上有郡，设总制，由中央委任。

在上述社会组织中，“两”是最基本的单位，25 家为 1 两，相当于村，“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两司马是社会基层的生产组织者、财产管理者、军事领导者，而且还担负着教育、治安、司法、宗教上的责任。按照这个设计，25 家的儿童，每天都去礼拜堂，听两司马教读“圣书”。内部发生纠纷，两司马要调查和裁断。两司马每年还要保举人才。可见，“两”就成为一个把土地、民政、军事、财政、宗教、教育、礼仪、司法、选举等各项社会权能统一起来的基层组织。

洪秀全试图通过这个以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中心的包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综合改革方案，来建造“天下一家”、“天下太平”的地上天国。

《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绘的理想，是农民小生产者的理想。关于土地均分、财富公有和平均分配消费品，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渴望摆脱贫困，实现家家温饱，反对贫富差距的要求。千百年来，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压迫下，农民群众一直以平均主义为思想武器，要求平分土地，平分社会财富。唐朝黄巢大起义，黄巢就以“天补平均大将军”的名义发表声讨唐朝的檄文。北宋王小波起义，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则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直接触及土地问题。《天朝田亩制度》的提出，是历史上起义农民美好理想的一脉相承的发展，标志着广大农民的长期愿望经过千锤百炼而达到前所未有的极高水平，变成了一个明确、具体、全面、系统的纲领。这个纲领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是个破天荒的伟大创举，说明太平天国运动把农民革命推到一个高峰。

正因为洪秀全的理想蓝图集中地表达了千百万农民群众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因而才大大地激发、鼓励农民和贫苦群众为争取自己劳动和生存的权利而奋勇斗争。在太平军所到地区，广大农民和贫苦群众总是热烈拥护，热情为太平军提供帮助。

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财富公有的思想，虽然有政治动员的作用，有冲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进步意义，但却是空想的、非现实的。企图废除一切私有财产，把整个社会经济改造成清一色的小农经济，恢复古代的农村公社组织，这在 19 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是根本行不通的。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逐步解体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生长和发展。太平天国运动的主体是农民，他们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小生产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无法认识和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天朝田亩制度》的许多规定，包含着与当时历史要求相违反的因素。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发展资本主义，可是《天朝田亩制度》却要求消灭任何形式的私有制，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际上，真正的公有制是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只有大工业的高度发展才能为消灭阶级压迫和贫富不均准备条件。

事实也证明了这个道理，洪秀全的理想社会方案在实行中遇到重重障碍。

太平天国刚刚定都天京时，曾宣布废除手工业的私有制，废除商业，建立“诸匠营”，“百工衙”，组织城中居民参加没有报酬的集体生产，宣传说“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居民的衣食

生活用品全由政府包揽，以人定等，按等配给，一般居民大口 1 石，小口 5 斗。在生产力极为低微之下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使天京政府的包袱越来越沉重。刚到次年四五月间，天京就发生粮荒。天京政府不得不下令：除了诸王，一切人都要吃粥，有敢吃干饭者斩首。洪秀全为了稳定人心浮动的局面，专门就吃粥发布一道诏旨说：“ 神爷试草桥水深，如何食粥就变心？ ”

取消商业，物资流通不畅。天京政府便取消了对商业的禁令，改由政府经营管制。凡商人愿意开业的，发给执照，到圣库领取资本，经营的种类和利润都有限制。商人集中在天京北门外设肆，有杂货、玉玩、绸缎、布匹、米油、茶点、海味等业。实行了几个月，还是行不通，商人没有积极性，各店纷纷歇业。在天京城外，却允许自由买卖，城内太平军也来城外购买东西。

《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的分田方法在现实中也无法施行。因为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正在进行中，太平天国控制的区域不断变动，农村秩序不安定。而且土地与人口的搭配，情形非常复杂，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土地分配既然不能实行，各地的圣库不能建立，而太平军庞大的军费压力和天京政府及诸王府庞大的供给，很快就成为问题。为了筹集支持战争和天京政权的粮食、钱财，征收赋税势在必行。1854 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根据部分地区已开征赋税的实践，向洪秀全建议：自“ 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 ”洪秀全立即批准了这个建议。结果，太平天国实际执行的还是“ 照旧交粮纳锐 ”的田赋政策，即沿用清朝政府征收田赋的制度。依照清政府田粮赋册，每年秋季向业主（主要是地主，也包括自耕农）计亩征收漕米。地丁银则分上忙下忙两次交纳。

洪秀全在理论与实际、理想与现实方面陷入矛盾状态。他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却又不能真正实行。但这不是他个人的错误，而是时代的规定性所决定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铲除这一制度将根本改变这个社会的性质。历史经验表明，单靠农民自己的力量，不能铲除封建制度。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袖没有，也不可能制定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计划。他们只能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在悲壮曲折的革命历程中，一方面猛烈打击地主阶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合法存在。

但太平天国政府毕竟不同于清政府，他们也执行了一些打击地主的政策，如：

没收一部分地主土地。太平军占领南京后，设天朝典农官，掌握在南京没收的土地。太平军称清朝官吏为妖，视其土地、财产为妖产，直接加以没收。常熟将“ 翁、庞、杨、王诸宦注明原籍，田尽入公，伪官目为妖产 ”。

剥夺地主浮财。太平军主要采用“ 打先锋 ”、“ 大捐 ”、“ 进贡 ”等几项办法，剥夺地主的金银财宝和粮食。太平军到一个新地区后，先进行广泛的调查，动员富室大户的佃户、仆人揭发，然后派军队去打先锋，捉地主，抄其家，仔细搜索，由于有眼线的情报，即使藏在瓦沟水塘的金银也能找到。“ 进贡 ”和“ 大捐 ”，就是太平军勒令富户、大地主献出数量相当的财富，“ 必千金数百金，谷米数百担。 ”“ 有贡黄金多至数百两 ”，贡的银子需四个人抬。

在太平军打击地主的鼓舞下，农民也欣起了斗争浪潮，最普遍的就是抗租减租。

以上打击地主的斗争，自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削弱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斗争。

五、杀杨诛韦

从 1853 年定都天京到 1856 年天京事变前，太平军处于战略进攻态势，是太平天国的兴旺时期。

太平天国为了捣毁清朝统治中心，巩固新生的天国政权，展开了北伐、西征和天京破围战役。

北伐军在 1853 年 5 月从扬州出发，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为首。这支 2 万多人的精锐队伍驰驱 6 省，转战 5000 里，虽然于 1855 年 5 月最终失败，但震撼了清朝统治的心脏。

北伐失败了，但西征却取得重大胜利。西征是与北伐同时开始的。1853 年 5 月，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 1000 余艘，沿长江而上进行西征。它的战略目标是夺取安庆、九江、武昌这三大军事重镇，控制长江上游，屏障天京，切断清朝中央政府与长江以南的联系，将太平天国区域扩大到整个江南。到 1856 年上半年，西征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使千里长江为太平军所控制，粮食和其它物资源源运进天京。这也为天京破围战，即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创造了条件。

1856 年 4 月，秦日纲率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先攻击江北大营，连破大小营垒 120 余座，江北大营清军望风溃散。6 月，杨秀清又从天京派出大军，与由安徽回师的石达开大军会合，进攻驻孝陵卫的江南大营。大营被攻破，清军死的死，逃的逃，统帅向荣乘夜晚逃往丹阳，忧惧而死。

石达开在破江南大营后，乘胜西去，坐阵武昌。天国上下欢天喜地庆贺天京破围战大捷。此时，东起镇江，西到武汉，包括江西、安徽大部分地区在内，都属于太平天国区域。

可是，在这一全盛期发生的天京事件，却成了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天京事件是太平天国领袖间的严重内讧事件，发生这一事件的表面原因是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但如果把这仅仅看成是偶然事件，或是某一个领袖的个人品质问题，那是不恰当的。这一悲剧的出现，是天国政权逐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的产物。

前面讲道，洪秀全在经济上遇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政治上，洪秀全也遇到了专制与民主、集中与分散的矛盾。

在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初期，政权组织形式是带有农民的民主色彩的，在天王之下设军师及五军主将，后来发展成五王制，并且彼此间都以兄弟相称，同是上帝子婿。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即天王在领导地位上是最高的，但又不具体处理政事，实际权力掌握在军师手里。这是农民的民主主义与封建君主制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国家政体。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在太平天国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首义诸王能够吃、睡在一起，“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诸王团结一致，共抗清军，不这样太平军就不能生存。定都天京前，太平军官兵大体上过着平均的供给生活。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也常“敝衣草履，徒步相从”。进入“金陵小天堂享福”，是他们奋斗的动力之一。果然，到了天京，天国领袖们均在不同程度上讲排场，摆阔气，甚至互相争奇斗富。

尽管与清军的战斗还在进行，但天京城内却多处大兴土木，广建诸王府。

洪秀全的天王府周围十余里，墙高几丈，内外两重，里面的各座宫殿皆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洪秀全俨然以皇帝自居，封建帝王的专用字“诏”、“旨”、“朕”都承袭下来。金田起义前写的“三原”著作，在定都后重刻时，原文中的“训”、“歌”之类的字一律改为“诏”。定都次年颁布的诏书说：“天下万国朕无二”，强调自己独一无二的“君”的身分。

洪秀全确立世袭制，儿子洪天贵为幼天王，也称“朕”，行使天王权力。幼西王、幼南王、幼东王均承袭其父爵位和职务，破了封建王朝袭爵而不承职的惯例。从最高领导人到两司马与各级官员，都可以“世食天禄”、“累代世袭”，这必然在社会上造成越来越多的特权阶层。

各王出巡时排场很大，显示威风。洪秀全坐 64 人抬大轿，东王杨秀清坐 48 人抬大轿，鸣锣喝道和护卫服侍的多达千人，前呼后拥。诸王及指挥以上官员外出，下级相遇不回避不跪道旁而继续行走者，斩首不留。各王还像封建帝王一样广选民女入宫。洪秀全有 88 位“王娘”。9 岁的幼主洪天贵也有 4 个“幼娘娘”。洪秀全给后妃们定出“十该打”的规矩，如“讲话极大声”、“面情不欢喜”等都在“该打”之列。

伴随着追求享乐、讲究排场和等级而来的，必然是争权夺利和互相倾轧。

作为太平天国最高领袖的洪秀全，深居宫中，变成一个宗教迷，把主要精力耗费在宗教教理的论证和写作上，耗费在如何管束宫女王娘和追求享受上，对于军政大事无力过问。

而杨秀清随着大权独揽，势力膨胀，也产生了问鼎最高领袖宝座的野心。

在天京，东王府是处理天国政务的中枢，一切军事号令皆由东王所出，刑赏生杀、升迁降调均由东王所定，洪秀全只在杨秀清草拟好的诏谕、文告上标“旨准”二字。朝中诸王百官除了奏谢恩赏可达天王，其余一切实际的军政要务都要禀报东王，“听其裁决转奏”。

这一种“一朝二主”的局面显然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杨秀清自恃功高权大，越来越骄傲。他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特殊地位，作威作福，打击异己，甚至对天王洪秀全和首义诸王也随便凌辱，以求树立自己的权威。定都天京后两年，天国高层领导人被杨秀清杖责（打板子）过的就有：洪秀全哥哥洪仁发，因杨秀清召集开会时迟到而被杖；北王韦昌辉，因下属出了问题而被杖；燕王秦日纲、兴国侯陈承瑢、卫国侯黄王昆，因牧马某甲案无辜被杖。甚至洪秀全也差点儿挨了杨秀清的板子。事情经过是：

1853 年 12 月，天王府有 4 个女子在雨雪中挖塘，杨秀清以洪秀全虐待宫内女官为由，假托天父下凡，把洪秀全召进东王府，跪在自己面前，听取他用天父名义发布的旨意。他怒气冲冲责问道：

“尔有过错，尔知么？”

洪秀全跪在地上回答：

“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

杨秀清又大声吆喝：

“尔知有错，即杖四十。”

在场的北王韦昌辉和众朝臣一齐伏地哭求天父开恩赦免天王，并愿代天王受杖责，杨秀清还是不罢休。直到洪秀全俯伏地上，口称“小子遵旨”，准备受杖时，杨才罢手，声称“尔已遵旨，我便不杖尔。”

可见，杨秀清此举不是出于对妇女的保护，而是借题发挥，蓄意要在众人面前让洪秀全出丑，迫使天王无条件地屈从于自己，以验证和显示自己至

高无上的权威。

事情过后，杨秀清又将天王甘愿受杖以及天王赞美他的话，详细记入《天父下凡诏书》中，颁行全国，大树其权威。

杖责天王这出颇滑稽而又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反映了洪、杨之间的矛盾，也是天国特殊政体中的矛盾。从世俗政治上看，洪秀全是天王，一国之君，称万岁，杨秀清是东王，为臣，九千岁，位于洪下，二人是君臣关系。但在拜上帝教教义中，杨秀清是皇上帝（天父）代言人，洪秀全是皇上帝次子，杨、洪是父子关系，杨的神位高于洪秀全，随时可用天父权威去教训洪，用神权去指挥政权。

可以说，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必然导致领导人争权夺利，而“一朝二主”的体制又使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发展成内讧是必然的，只是个时间和时机的问题。

果然，到了 1856 年上半年，天国在战场上形势一片大好，清政府对天京的军事压力解除了，杨秀清认为这都是自己英明指挥的功劳。并认为问鼎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于是演出了“逼封万岁”的恶剧，导致了天京大屠杀的悲剧。

1856 年六、七月间，杨秀清为了扫清他称万岁的障碍，先后将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借故调出天京。

8 月中旬的一天，杨秀清借天父下凡，召洪秀全到东王府，以“天父”的口气说：

“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gèn，广东方言，意为如此）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

洪秀全答道：

“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

杨秀清更进一步问：

“东王世子（儿子）岂止是千岁？”

洪秀全干脆回答：

“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

洪秀全预感到自己的君权受到威胁，便使用缓兵之计，很痛快地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应允在杨秀清生日（阴历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正式举行封典。随后，洪秀全秘密下诏给当时在江西的韦昌辉、在湖北的石达开、在镇江的秦日纲速回天京保驾。

韦昌辉接到密诏后，立即带心腹精兵 3000 人自江西飞驰回京，于 9 月 1 日深夜抵达天京城下。当时，天京城由东王部队守卫，城门紧闭，城上昼夜巡逻。杨秀清曾规定，出征的将士如无东王的命令，不得擅自进入京城。可见杨秀清也有预防措施。但此次韦昌辉的 3000 将士由“洪秀全开门放进”，迅速控制城内要道，重重包围了东王府。韦昌辉只带数人，潜入东王卧室，杨秀清正酣睡，遂被杀死。接着血洗东王府，杀死杨秀清的妻小及王府的文武官员、卫士、役使，不分男女老幼，尸体遍地。韦昌辉用木箱装上东王的头呈送洪秀全，要求标为“老奸头”公开示众。因为韦昌辉打着清君侧、除奸党的旗号，又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使杨秀清的部众一时不知所措，大量被杀。

洪秀全、韦昌辉为杜绝后患，继续扩大屠杀范围。然而东王部队也没有全部束手待毙，也曾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于是，在事变的第二天，由洪秀全

下诏，“谴责”韦昌辉、秦日纲滥杀无辜，9 月 4 日，在天王府门前由女承宣官宣读洪秀全诏旨，并当众杖责韦、秦二人，通知天京军民和东王部属前往观看。韦昌辉事前周密安排，将放下武器前来观看的杨秀清部属 5000 多人全部杀害。此后，韦昌辉为肃清东王余部，仍搜杀不止，时间持续 2 个多月，总计杀死太平天国重要领导及骨干分子、一般将士 2 万多人。

9 月中旬，翼王石达开赶回天京，不满韦昌辉疯狂屠杀，劝其息兵止杀。韦昌辉不仅不听规劝，反对石达开起了疑心。石达开预感到危险，急忙从小南门系绳索吊落在城外，速返安徽的大本营。韦昌辉未能抓到石达开，便将石达开在京城的妻子、子女及属员全部杀死。

韦昌辉又派秦日纲率 1.5 万人乘船追赶石达开，当秦得知天京城外的太平军都同情支持石达开，才转而对清军作战。

石达开回到安庆大本营，国难家仇齐上心头，从武昌调集 4 万大军，宣布讨伐韦昌辉、秦日纲，并要求洪秀全送上二人首级，否则班师回朝攻破天京。

太平军中的大多数心向石达开，韦昌辉日益孤立。洪秀全先是悬赏重购石达开首级，此时见人心不可违，遂下诏诛韦。韦昌辉不甘束手就擒，索性率兵围攻天王府。经过两天战斗，韦昌辉兵败被杀，秦日纲也被处斩。韦昌辉的头被盛在盐箱里送到安徽，让石达开验看。

石达开于 11 月底回到天京主持政务，历时两个多月的腥风血雨停止了。

洪秀全通过杀杨诛韦，重新牢牢掌握了太平天国最高权力。但是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高昂的——

中央政权出现了权力真空和混乱局面。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被杀，变乱后，翼王石达开又因被猜疑而负气出走，这样，当初金田起义诸王只剩下天王洪秀全一人。

太平军力量大大削弱。大批精兵强将死于自相残杀，诸王所属部队瓦解、离散，太平天国出现了“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景况。

天国军民陷入思想混乱。“天父”与“天兄”的争权夺利与相互残杀，引起信仰危机。拜上帝教的宗教宣传不灵验了，天国的精神支柱断裂了。“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袱回家转，还是做长工”，反映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太平天国事业失去了信心。

六、实施新政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虽然担负了总理天国政务的重任，但洪秀全唯恐大权再次旁落，于是又封了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以制约石达开。安、福二王“又无才情，又无算计”。石达开无法充分施展才干和抱负，内心对安、福二王的挟制存有很深的的戒心，担心天京内讧的悲剧会再次重演，于是赌气出走。他于 1857 年 5 月底率太平天国精锐部队十多万人离开天京，先后转战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由于没有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斗争目标不明确，逐渐引起部下不满。1861 年，一部分太平军在吉庆元、朱衣点带领下，从广西“万里回朝，出江扶主”，与江西的太平军会合。洪秀全授予这支军队以“扶朝天军”的称号。这年底，石达开率余部再出广西，试图进入四川以实现“久想占据四川省”的计划，但于 1863 年 6 月在四川大渡河边陷入清军重围。石达开及部下 2000 多人最后被杀。

洪秀全在石达开出走后，于 1857 年 8 月取消了他的两个哥哥的王号，希望能使石达开回朝重新辅政，但石达开执意不回。无奈，洪秀全只好着手建立新的领导核心，于 1857 年 10 月任命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次年，又恢复了五军主将制度，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蒙德恩为中军主将。这年冬天，杨秀清的弟弟杨辅清回天京后，被洪秀全封为中军主将，免去蒙德恩的中军主将。这个新的领导核心，除了蒙德恩，其他几人都是长期带兵、骁勇善战的将领。陈玉成 14 岁参加金田起义，因英勇作战而从战士逐步提升起来，屡建奇功。李秀成也身经百战，先后任军帅、监军、指挥等职，1856 年被提升为地官副丞相。洪秀全及时发现了他们的才干，委以重任。同时，洪秀全宣布自任军师，他说：“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亲自总掌军政。

天京事变及石达开出走后，清军趁机加强攻势。1858 年 4 月清军占领雨花台，再次围困天京，江北交通断绝。5 月，湘军分两路，互相策应，重点进攻安庆。为摆脱天国面临的军事危机，8 月，陈玉成、李秀成和各路将领在安徽枞（cōng）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传达了洪秀全关于粉碎江北、江南大营，解除天京包围圈的指示，研究和具体布署了太平军的作战计划。会后，太平军各部协同作战，采取攻势。经过以浦口之役为主的一个多月的战斗，再次打垮了江北大营，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封锁。接着在 11 月 2 日取得了三河战役的胜利，使安庆解围，基本上遏止了清军长驱直入的进攻，扭转了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危局。

解决了军事上的危机，洪秀全又依靠洪仁玕试图革新政治。

洪仁玕是 1859 年 4 月 22 日冲破重重封锁到达天京的。当年金田起义后，他去广西浔州，但太平军已去了永安，他未能赶上，因前行的道路已封锁，便返回广东。为躲避清政府搜捕，又去香港，在外国牧师处教书。他利用这个机会，细心研究西方的宗教、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结交了一批外国传教士。他是太平天国中难得的富有世界知识的领导人。

洪秀全见到洪仁玕，又惊又喜，称赞他“志同南王，历久弥坚”，“板荡忠臣，可为万世法”，封其为干王，总理朝政。同年 6 月，洪秀全又封陈玉成为英王。不久，又封李秀成为忠王，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

洪仁玕看到太平天国政涣人散等严重问题，立意通过革新而重振天国，

使中国独立富强，开创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他在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思考后，向洪秀全提出了振兴太平天国的纲领《资政新篇》。

洪秀全对《资政新篇》非常重视，在审阅中逐条作了批示，大都批上“是”、“此策是也”字样，完全赞同。只有两条不同意，一条是设新闻官，专收各省及外国新闻，批道“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等日后杀绝妖魔再实行。另一条是刑法方面的戒杀，洪秀全批道：“斩邪留正”，杀妖魔、杀有罪的人不能废止。

《资政新篇》经过洪秀全批注，刻印后颁行，可以说，其中的改革措施、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是符合洪秀全的思想的。

《资政新篇》共 4 部分：1、用人察失，严禁朋奸；2、革除腐朽习俗，提倡福音真道；3、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仿效西方国家；4、采用新的刑法制度。

怎样革新？洪仁玕认为治理国家最关键的是“用人”和“设法”两条。在“用人”方面，强调“禁朋党之弊”，反对在太平军内部“结盟联党”，树立山头，主张“强本”，加强中央集权。这是针对太平天国存在的宗派、分裂现象而提出的。

在“设法”方面，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借鉴，对政治、经济、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革新要求。

在政治方面，要政令统一，上下统一，尊重民意，沟通下情。仿照西方国家“准卖新闻”和设“暗柜”。发行报纸，报纸可反映“民心公议”。“暗柜”即检举箱、意见箱，可使民众的意见直接上达中央。关于地方行政，乡官应由群众推举产生，并设立士民公会（民众团体），举办社会福利事业。以上这些政治上的资本主义改革，表面上针对的是集中与分散的矛盾，实际上却是针对君主专制与民主的矛盾。

在经济方面，提出了 20 多条仿效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制度的措施，如主张发展交通运输，包括兴建铁路、公路以及修浚河道、行驶轮船、兴办邮政等；发展金融事业，包括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等；还有开采矿藏、兴修水利、奖励技术发明等，这都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开辟道路。关于社会，主张发展文化卫生事业，办学校，办报纸，办医院；奖励慈善事业，办社会福利和慈善团体，如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和育婴堂等；禁止封建迷信，凡庙宇寺观和阴阳八卦，都要废除，僧尼道士还俗；禁止贩卖人口、使用奴婢以及溺婴；革除缠脚、金玉饰品、养鸟斗蟀、游手好闲等坏习气，移风易俗，这些都是为改变封建的腐朽落后生活方式，建立一个有生机的新社会。

关于中外关系，主张与西方国家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不准外国人擅自进入中国内地，不准外国诽谤太平天国的“国法”，同时要去掉以往封建皇帝妄自尊大、以“天朝大国自居”的骄矜态度，不必说“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以平等的原则同外国交往。

在法制方面，主张废除封建主义的严刑峻法，对于死刑犯，以绞刑来代替“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并实行“善待轻犯”的政策，用“修街、渠、道路”等监督劳动的办法，使其悔过自新。另外还主张把宗教和刑法分开来。

从《资政新篇》的基本内容来看，它是太平天国进行全面改革的新纲领，

试图用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改变天国的衰败面貌，并进而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由于洪秀全对其中几乎所有的主张都作了赞同的批示，并把它作为太平天国的官书印发，准备付诸施行，因此可以认为，《资政新篇》虽是洪仁玕写的，但也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政治思想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方面的新探索。

《资政新篇》与《天朝田亩制度》相比较，二者的相同之处均要求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均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图景。《天朝田亩制度》的主要优点，是以土地问题为中心内容，主张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但其主要缺点是，所设计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生产力很低的、没有私有财产的、绝对平均的社会，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资政新篇》的主要优点，是抛弃了空想农业社会主义，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提出一个发展近代工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的富民强国新方案。其主要缺点是，没有触及广大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因而不利于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

从这两个纲领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洪秀全思想的巨大变化，即，从“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彻底消灭私有制，到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他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取得的一个重大思想突破。

七、誓死对抗中外反动派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在进入 19 世纪 60 年代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因为外国侵略者已公开和清政府勾结起来，联手展开军事行动，用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绞杀太平天国运动。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而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开始愿意与外国侵略者合作。清军在联合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开始采用洋枪炮，学习洋操，编练新式海陆军，同时开办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清政府中一部分握有实权的人，如奕诉、曾国藩、李鸿章等，主张“借法自强”，即依靠外国侵略者来挽救清政府。外国侵略者认为，迫使清政府屈服比较容易，而迫使中国人民屈服则极为困难，所以需要扶植清政府，把它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于是，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初期，清朝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和好”的局面，而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扼杀的。

1860 年后，太平天国的战场形势是：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以 3 万兵力半包围天京，长壕逶迤数十里，大小营垒百余座，长江下游也被清军的船只封锁。太平军如只靠硬攻，解围是困难的。1860 年 1 月初，洪秀全采纳了洪仁玕提出的围魏救赵战斗方案，即太平军先东征湖州、杭州，诱使清军江南大营撤兵东援，然后再回师解救京围。1 月底，洪秀全命令李秀成、李世贤等向杭州、湖州进军。2 月，太平军攻克杭州，击毙浙江巡抚罗遵殿。果不出洪仁玕所料，江南大营派出 1.3 万余人援救杭州。太平军留下旗帜作为疑兵，将主力悄悄撤走，经皖南迅速回师。4 月，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各路太平军在建平（今郎溪）会合，商定分兵 5 路向天京挺进。

5 月 2 日，天京的破围战打响了，各路太平军从外线包围，分 5 路进攻江南大营。天京城内太平军见援军已到，也主动出击。被人称之为“和帅”的钦差大臣和春从梦中惊醒，不知东南西北，稀里糊涂披衣上马，一路狂奔先逃了。江南大营帮办军务、江南提督张国樑在丹阳南门吓得骑马落水，自溺而死。和春在苏州城外悔恨交集，又听到“副帅”张国樑的死讯，便用酒吞服鸦片自杀。江南大营的营垒长壕被太平军一一荡平，营中的几十万两银子和军火局的枪炮火药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

1860 年 5 月 11 日，太平军各主要将领会聚天京，庆贺解围胜利。洪秀全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确定战略方针分为二步：先东征，迅速夺取苏州、常州；再回师西征武昌，消灭湘军主力，解救安庆。

5 月 15 日，洪秀全派李秀成率军东征，先后占领常州、苏州、嘉兴、松江等地。苏南和浙西许多州县归入太平天国版图，洪秀全决定建立苏福省，以苏州为首府，包括周围 20 多个州县。建立各级政权，确立税收政策。苏福省的建立对于巩固天京政权和支援后期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9 月，洪秀全召集陈玉成、李秀成开会，确定了“会攻武昌，解围安庆”的西征战略。

陈玉成率军 9 月 30 日离天京，联合皖北捻军，组成六万多人的队伍，次年 3 月进占湖北黄州府城（今黄冈）。这时，英国侵华舰队司令贺布、参赞巴夏礼到汉口。巴夏礼专程到黄州会见陈玉成，百般阻挠太平军接近武汉。

李秀成比陈玉成晚 1 个月出兵，经皖南，威胁湘军老巢祁门。次年 2 月

李秀成进入江西，6 月进至湖北。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到兴国竭力劝李秀成放弃进攻武汉。由于外国干涉者的破坏，加上李秀成轻视这次西征“合取湖北”的重要意义，7 月从湖北退兵，9 月由江西进取浙江。

安庆已被清军包围 1 年，陈玉成、洪仁玕等援军均未能冲破清军包围圈。1861 年 9 月 5 日，清军用地雷轰塌西门城墙，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率全军 1.6 万多人一直战斗到最后，全部壮烈战死。安庆——这个太平天国控制 9 年的上游据点失守，从此天京西面失去屏障，处于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陈玉成、李秀成的西征宣告失败。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率军先退居庐州，又突围北走寿州，被地主团练头子苗沛霖出卖。先前苗沛霖因内部磨擦投向太平军，表示愿受陈玉成指挥。但后来又暗投清将胜保。他假装欢迎陈玉成到寿州去。陈玉成没有识破这个骗局，仅带少数随从入城，被苗沛霖抓住送到胜保的颍州大营。胜保在审讯时要陈玉成跪下，陈玉成怒斥手下败将胜保，“你见打仗就跑，在白石山我踏破你 50 个营，你全军覆没，只带了十几匹马抱头而窜。我叫饶你一条性命。我怎能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胜保厚着脸皮劝陈玉成投降，陈玉成大义凛然，厉声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表现了一个农民革命英雄的铮铮铁骨。胜保将陈玉成以槛车解送北京，听说太平军和捻军准备拦截，便在河南延津将他杀害。那是 1862 年 6 月 4 日，陈玉成才 26 岁。陈玉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将领，他忠心耿耿，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太平天国事业。安庆的失陷和陈玉成的牺牲，是太平天国后期极为沉重的挫折。

在太平天国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洪秀全错误地选择了靠“天命”宣传和宗教教义挽救天国的道路，企图以此来解决人心不振、将士抗命的现象。他动辄以“天话责人”，经常“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是”，沉溺于宗教和迷信。他受人挑唆，对力图整顿的洪仁玕一度不予信任，重新起用不得人心的洪仁发、洪仁达、林绍璋等。这些人无德无才，贪赃枉法。洪秀全又多封王爵，想争取人心，结果适得其反，大批平庸者通过行贿等手法被封为王。到 1864 年 7 月，太平天国已有 2700 多个王，赏罚颠倒，朝政混乱。

1863 年 12 月 4 日，苏州失守，李秀成回到天京。由于苏浙根据地濒于瓦解，天京孤立，形势万分危急。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放弃天京的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斥责。从这年夏天起，天京已出现粮荒。洪秀全带头吃野草，并令全城军民以吃“甜露”（野草代称）充饥，誓同敌人血战到底。1864 年 5 月下旬，洪秀全因积劳成疾而身染重病。临终前他下诏，要求太平军将士坚定胜利信心，努力杀敌，“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6 月 3 日，洪秀全病逝，享年 52 岁，其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时年 16 岁。

此时天京城内军民不足 3 万，能战斗的只有三四千人，但他们不畏强敌，仍顽强地抗击清军的进攻。7 月 19 日天京陷落，太平军英雄们或战死或聚众自焚，无一人投降，用生命的代价写下了太平天国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天京城破时，洪天贵福和李秀成突围而出，但不幸失散。李秀成在天京东南的荒山上被清军俘获，在写了几万字的“自述”后被曾国藩杀害。先在 1863 年底奉命出京催粮的洪仁玕与洪天贵福在广德会合，1864 年 10 月两人在江西被清军抓住后杀害。以后，太平军余部会同捻军仍然转战各地，一直坚持战斗到 1868 年。

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洪秀全以及千百万太平军将士的历史功绩却不会磨灭。

在鸦片战争后苦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洪秀全是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作为饱受剥削压迫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杰出代表，发动和领导了举世瞩目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 18 年，席卷 18 省，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也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天国英雄们，坚持民族气节，在政治、外交领域严词拒绝外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在军事上勇敢回击他们的武装进攻。

太平天国鼓舞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勇气，伟大的孙中山在领导反清革命之初，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赞扬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曾从太平天国的榜样中得到宝贵启示。太平天国的火种和它的历史教训，深刻地影响着后代，洪秀全及其战友的英雄业绩，在民间广泛传播。一切反动势力都阻止不住由太平天国所启导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代代继承下去。

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斗争历程证明，农民是反封建的主力军，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不可能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